

(上接第2版)

《万里归途》:外交叙事与中国气度

■文/姜牧阳



国庆档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以利比亚撤侨事件为蓝本,讲述了前驻当地外交官宗大伟与成朗深入虎穴,成功营救125名中国同胞的感人故事。该片突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的创作瓶颈,不仅塑造了鲜活立体的外交官形象,也改变了国民形象在银幕上的失语状态。撤侨故事突出了中外人士的合作关系,并巧妙地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与邻为善、以邻为邦”的外交方针融入剧情。此外,IMAX特制拍摄、1:1打造的异国场景、血脉贲张的战争场面,都为观众提供了一场极具沉浸感、酣畅淋漓的视觉之旅。可以说,这部电影较好地实现了现实主义创作与工业美学的结合。

一、新超级英雄的诞生

检察官章宁生活中虽然有点玩世不恭、油嘴滑舌,但他情商高,有超强的统筹和协调能力。这种反差,正是新超级英雄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类新超级英雄受儒家思想熏陶,行事有儒者风范。过人的忍耐力和韧劲,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忍受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即使反抗也不会诉诸极端的行。他们关注此岸的现实世界,有明确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也会努力争取合法的权利。宗大伟是有私心的人,他会厌倦外交职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从一开始他就想过放弃。而支撑他完成撤侨任务的基础是“义”,“义”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自古就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之说。“义”沉淀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也烙印在道德修养和性格当中。

章宁的牺牲改变了宗大伟的决定,他突然意识到在纷乱的局势下,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为了让章宁的死更有价值,也为了对得起外交官的职责,他应当承担起救助同胞的责任,这是兄弟之义、袍泽之情,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当他被反叛军逮捕并以死威胁时,他临危不乱,义正辞严拒绝了对方无理要求,誓死捍卫中国的外交立场,这是他的忠义和正义。

宗大伟是带有反英雄色彩的人物,他多次展现的怯懦和犹豫映照了他的平凡。完成撤侨任务也意味着他重“返”英雄之列。由于飞机上的位置有限,他只能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同胞。可妻子即将临盆,自己又归期难定,返回使馆的路上,他宣泄了自己的不满。章宁殉职只是一个激励事件,迫使他被动地接受使命。真正让宗大伟主动改变的是两次俄罗斯轮盘赌,宗大伟第一次因怯懦和犹豫,不敢与叛军首领对赌,这直接造成了外籍帮手的死亡,对此他深感愧疚。第二个是叛军首领以全部国民的性命威胁宗大伟,为了完成撤侨任务,宗大伟正面迎战。巨大的心理压力也让宗大伟几近崩溃,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生理反应。宗大伟扣动扳机后发现,叛军首领从未放入子弹,但宗大伟的选择证明了他实至名归的英雄。这不仅仅在于他拯救了125条生命,更是他克服性格缺陷,完美蜕变。

以往的外交题材电影重视塑造伟人、强调个体的力量,国民形象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他们的个人感受和愿望无法呈现在银幕上,但《万里归途》迈出了重要一步。它重点突出了被施救的对象,这些对

援建工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不同的身份和教育背景,性格、喜好各异。他们背井离乡,支持中国的外交事业,自己默默忍受着思乡之苦。书写这些平民英雄的故事,是尊重他们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更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影片让外交官与普通援建工人同登银幕,国民与国家心理距离不断拉近,建构了一个群体共识与认同的文化世界,增强了观众自身的国民认同感。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银幕呈现

在外交领域,体现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外交模式。但电影《万里归途》冲破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在人物关系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家文化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行为,中国人强调家国的同质关系,所谓“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它使得中国历经千年的变化,依然能凝聚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世界上独特且难以撼动的政治伦理。

家蕴藏着一种伦理原则,忠诚是个人修养,也是维系国家权威认同的基础。忠诚是小我向我我的转移,从个人的利益拓展至与他人的关系。片中,宗大伟正是从对妻子和孩子的爱,上升到对中国同胞的爱,对职业信仰的坚守,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家也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在世界上生活,“我”对世界肩负着责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它既尊重不同人群和国家的差异性,更注重人类的共同性,注重每一个人均与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援建的历史始于上世纪6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非合作不断加深,中非人并肩奋斗,休戚与共,铸就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精神,既成为指引中非关系继续往来的动力源泉,也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价值所在,传递出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创作者借助两位特殊的女性,传递博爱的外交理念。白嫫是章宁的妻子,也是一名驻外公司的高管。影片中,她是外柔内刚女强人,她可以在极端环境下镇定自若地统筹全局,也可以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依旧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协助宗大伟完成撤侨任务。通常,在男性主导的主旋律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概念化,《万里归途》对女性形象的深度开掘,有助于凸显战争给正常生活带来的改变,体现女性在战争中的坚毅品格和英雄气魄。

白嫫收养了一个努米比亚的战争孤儿,并视如己出。为了不让女儿做反叛军俘虏,白嫫宁愿放弃归国的机会,留在战火纷飞的努比亚陪伴女儿。两个原本生活在不同种族的女性,因战争从陌生到相依为命,并成为了彼此孤独生命中的慰藉。人们习惯了祖国比作母亲,白嫫的母爱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它将中国母亲对努米比亚女孩的爱,转化为一种跨越民族的博爱,彰显出中国博爱的胸怀、兼济天下的大国气度。

该片创造性地为配角配置了一位来自努米比亚的帮手,他作为向导,帮助宗大伟和成朗寻找失联的同胞,彼此之间始终保持平等、互尊、互信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宗大伟为难,也为了让中国

人尽快回国,在叛军首领的威逼下,他毅然地拿起枪将枪头指向叛军首领,但是却被叛军手下人一枪击毙了。根据剧作理论的解释,伙伴是启发主角成长的催化剂。主角在这场“借假修真”的旅途中,会逐步发现自己已缺陷,而这正是伙伴的价值所在。宗大伟在伙伴身上找到了勇气、担当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以说,中国撤侨的成功离不开努米比亚人的无私帮助,而努米比亚人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努米比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交得其道,千里同好,正是中国人的外交之道。

三、对战争与苦难的态度

《万里归途》虽然是一部外交题材电影,但也加入了大量惨烈的战争场景,旨在引发观众思考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并从中国人对待苦难的态度折射出中国气度。

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是政治交往的工具,也是政治意图和目的的手段。努米比亚内战是部落之间为各自的政权争夺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引发的战争。从法理上看,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战争也隐藏着重要的伦理问题,即战争的合理性与道德之间的区别。显然,努米比亚的内战违背了交战正义的道德原则。

通常,战争不进攻非战斗人员。影片中,高高吊死的、身首异处的尸体,流离失所的难民随处可见,失去母亲的婴儿趴在地上哀嚎,努米比亚成为了一个人间地狱。造成这个悲惨局面的,正是叛军的“无区别性的集体杀害”行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任意践踏。

影片的另外三次瞬杀事件,也是这种“无差别性的集体杀害”行为的结果,章宁、与中国较好的努米比亚军官以及真诚、善良的边境官,他们以诚待人,怀有善心,却都毫无预兆地死亡,这都试图说明在战争环境下,人命如蝼蚁,无尊严可言。

集体杀害行为是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战争不仅会造成人们严重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它还引发了参战者们的杀戮快感,表现为叛乱军的高地轰击、疯狂的机枪扫射与吊杀行为。俄罗斯轮盘赌是另一种更加极端的杀戮方式,这个游戏源自克米比亚战争,它是军人们在面对国家的失望和战败的情境下,娱乐自己、释放压力的手段。由于极端恐怖下的自保意识很容易演变成习惯性的杀戮,也就完全变成了杀人机器,和野兽并无二致。在这些人的心里,只有眼前恐惧的、鲜血淋漓的人脸才能使他们快乐,屠杀的欲望浸入他们的骨髓,正确与错误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杀人的欲望。

而造成这种扭曲人性的深层原因,是极端的政治思想。努米比亚内战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它营造了一种“非我”的境遇,深处政治游戏中的人,多少都会感到身不由己的疲惫。在纷乱的政治争端中,作为生命个体的人都是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人性遭到扭曲,自我也无处找寻。正如片中多次出现的阿拉伯谚语:“面具戴久了,真成你的脸了”,荣格认为,社会化的自我是带上人格面具的自我,人格面具是人执行社会功能的必要手段。虽然人们带上它会有丧失个性的可能性,但一旦卸下,就不得不正视脆弱的自我。为了一种虚假的心理安全感,

人们通常会拒绝脱下面具。渐渐地,人们习惯了带着面具的自己,并甘之如饴。

创作者试图通过展现惨烈的战争景象,呼吁大众用“审慎”的态度对待战争。对于有决定权的政治家而言,他们应当平衡战争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战争观是反对一切战争,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现实主义的战争观则认为,战争没有正义与否之分,战争与道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它只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对此,参战双方应当以道德原则为基础,因为道德和政治已经交织在政治历史之中。

对于普通人,我们也需要在“非我”的境遇下,努力找回“真我”。任何人都是社会环境中的一分子,寻求“真我”需要解构那些羁绊人性自由的、与自我实现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本片中,中国外交官拯救同胞时,多次强调尊重各国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努米比亚战局的急速恶化,与他国为一己私利插手努米比亚内政的密不可分。

个体需要一种生命意志,它是一种原始本能的生命强力,也是积极面对苦难的能力。原始本能在影片中体现的是女性的母爱、不同民族之间的博爱和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和共情心。面对苦难的积极方式是永远保持乐观的形态,就像宗大伟所说的“为什么不相信明天会更好”,拥有强大的、足以对抗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更重要的是,人们应当追求一种超越性的“向上意志”,它会转化成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影片中,这个“向上意志”是对永恒的正义与和平的信念。这种生命意志能够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下,对抗非理性的魔力,回归内心,实现自我拯救,而非随波逐流。

影片用互文性的手法,将中国的撤侨行动与童话《辛伯达航海旅行故事》对应。《辛伯达航海旅行故事》讲述了辛伯达为了找回“和平之书”,历经七次冒险,九死一生的故事。他在与邪恶女神的斗争中,逐渐找回了勇敢、魄力和无畏的气概,最终打败了邪恶女神。而且还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归属——宗教,一种超越生命的永恒。

宗大伟和成朗就是现实生活版的辛伯达,邪恶女神是努米比亚的叛军,他们一次次深入虎穴,与敌手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宗大伟和成朗都克服了性格缺陷,变得更加刚毅和勇敢。影片结尾,宗大伟敢于与叛军首领赌命,成朗敢于端起摄像机威胁叛军,为宗大伟创造生机。最终,同胞回国,二人找回了“和平之书”。经过此次洗礼,二人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永恒正义。为此,即使肉体毁灭,但实现了绝对精神的统一。这种绝对精神,正是超越性的“向上意志”。

当然,创作者还强调了知识对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重要意义,片中的童话书就是知识的象征。宗大伟在找药品时,无意发现了被烧的《一千零一夜》,他将书送给小女孩是为了缓解她的焦虑和恐惧,而女孩读故事的画外音,冥冥之中指引着宗大伟奋力前行。小女孩通过故事获得了面对艰难现实的勇气,对未来满怀希望。宗大伟也在故事中获得了对抗敌人的勇气,并不断进行精神的洗礼。对于二人来说,他们的精神支柱都能在知识中获得。

通过对战争的描写,创作者试图重新思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和平也是政治的延续,和平与战争应当保持对立统一性。古人曾言“止戈为武”,任何战争都应合乎人性、正义,也都应当理性视之。而身处复杂社会的我们,一定坚定正义的信念,它能够让我们不堕入虚无,沦为极端政治思想的工具。

《万里归途》以国际化的视野重新书写了中国的外交故事,塑造了本色风流的人物形象,传递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中国品格,揭示出穷达不堕的中国操守,表现出视死如归、宁折不弯的中国气节,以及向道而行的伟大抱负,并最终回归到俯仰天下、有容乃大的中国气度。

◎ 管理服务“全方位”,用心打造惠民便民的群众观影“文化圈”

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作为公益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主力军、核心运营单位,团结带领全国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者通力协作,着力强化队伍建设,积极创新服务模式,规范管理要求,将高标准和严要求贯穿到每一个环节,呈现出创先争优、放好影片的工作新局面,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一是放映队伍素质持续提高。中心和各省区市农村院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政治学习和工作能力提升为重点,加强放映员教育培训,放映队伍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放映员思想根基进一步牢固,放映质量进一步提高,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队伍。云南、北京、山东、内蒙古、上海、海南等多个省区市均举办过多次主题明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培训班、竞技班等,学习国家相关放映任务和要求,明确农村电影放映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加强放映员的先进经验交流,推动全体放映员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增强岗位工作荣誉感,提升职业技能素养。

二是观影配套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根据2020—2021年农村电影放映行为及满意度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受访观众对于农村电影放映的观影环境有更高期待。目前,全国范围内设备优良、座椅舒适的公益电影观影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开展。武汉天河电影集团在2013年投资约30万元在放映点搭建了大型LED固定银幕架等基础设施,2018年又联合市水务局投资20万元对天河江滩影院的银幕架以及放映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2021年,上海市在电北管村建成了全市首个新型农村电影放映示范点,配备了高功率7000流明激光投影机、7.1声道专业电影解码系统和达到4K效果的高清画框银幕。音响、幕布、投影、座椅等硬件设施都做了高能效更新升级,并配备了可移动式观影座椅。

三是规范化管理服务更加精细。服务方面,中心大力推广应用DMCC APP,建立分区服务机制,打造一站式服务模式,不断提

◎ 平台技术“全升级”,激发电影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的新形势新要求,用互联网思维完善公益电影技术服务体系,主动担当作为,积极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电影“十四五”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农村放映优化升级”、“升级电影公共服务”的任务要求,为放映好影片提供坚实的管理服务保障。

一是基本建成公益电影国家服务平台。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移动计算等新技术新手段,积极研发打造适应多层次、多维度的一体化信息平台、智能化新终端,个性化影片供给体系、移动化交易放映服务运营平台,更好履行发布信息、交易订购、统一结算、统计数

据,监管公益影片放映情况等职责,贯通“百姓点单”工作模式,大幅提升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服务的灵活性、拓展性和易用性,提升服务效能和观影体验。二是开发完成播控传输新终端。主动应用更高规格编码、国产化加密授权管理、智能传送播映等新技术,加速开发智能化新终端,将放映画面质量提高了一倍,实现了手机智能播映和影片内容云传输快速送达。便捷放映员通过手机APP订购、下载、播放影片,实现了“多模式”定位和日志实时回传,支持对放映活动全流程数据的有效管控。新终端与国家农村数字电影服务平台相配合,大幅提升了

高面向放映主体的服务效率;面向公众推出放映公示服务,对接“高德”、“百度”等互联网地图服务,开展观影满意度调查工作,打通与观众放映信息获取、观影评价反馈的双向通道。管理方面,中心在完善推广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回传监管系统和基于GPS/GPRS的全国农村电影放映监管平台的基础上,建设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地图以及“映前一映中一映后”的综合性评价平台,开展“时钟专项维护”行动,实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管理“规范年”活动,编制发布《DMCC大数据电影市场数据分析报告》,持续做好国家级“农村电影放映+监管”工作。各地也因地利制宜不断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如:江苏省出台《江苏省农村电影放映监管办法》,完善农村电影监管平台功能,建立监管平台日常巡查和暗访制度,规范放映行为;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农村电影放映监管实施细则》,建立了省级农村电影放映GPS/GPRS监管平台,进行全

面、有效的监管;山东省把农村电影放映作为文化惠民重点工程,推行“标准化放映七规范”,提升多元化服务质量;广东、湖南、辽宁、安徽、天津、黑龙江等近三十个省份均建立省级监管平台,精准收集省内农村电影放映信息。规范化管理服务持续保障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确保政府资金投入惠及于民。

四是“公益电影+惠民服务”愈加多样。近年来,全国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者围绕电影放映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和惠民服务,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内蒙古成立“文明光影志愿者服务队”,以文明实践为抓手开展各有专长、各有特色、更加精准的服务;山东安丘“雷锋号”放映队利用进村放映间隙,为群众义务修电器、收粮食、帮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打扫庭院等;江苏扬州红色电影放映现场,不仅有高清画框银幕,音响、幕布、投影、座椅等硬件设施都做了高能效更新升级,并配备了可移动式观影座椅。

三是规范化管理服务更加精细。服务方面,中心大力推广应用DMCC APP,建立分区服务机制,打造一站式服务模式,不断提

观众的观影体验,同时极大地简化了操作流程,方便使用,方便观影。

三是设计研发智能监管平台。在全国公益电影放映监管服务平台基础上,设计完成省级公益电影放映监管服务平台方案并加紧建设。建成推广后,可实现国家平台与省级平台在公益电影放映服务的数据要素、数据规则等方面的贯通,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公益电影放映监管中的作用,为各级主管部门提供管理数据支撑,提升放映监管数据、场次结算数据的统一性和精准性,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公益电影放映场次结算数据管理系统,更好地实现因地制宜做好、管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任务目标。目前,中心正在与部分省市开展试点工作。

四是建设融活资源的“中央厨房”。对中心现有节目平台进行流程优化、重构和再造,建立统一的多渠道电影内容供给中心系统和调度机制,形成集农村电影节目录规划、采集、编目、制作、传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多媒体综合平台,实现电影数字节目平台从“库房式”节目存储应用向“厨房式”智能内容供给平台提质增效,从运行链路中的内容供给端开始,创新应用方式,实现内容精准供给,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节目制作集约化标准生产,提供技术支撑和内容资源。

(执笔人 魏月)